



“纯性”与“热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罗克凌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现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纯性”与“热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关键词：中国现代作家；“南洋”；土著形象；“纯性”；“热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06-0061-04

PDF 获取：<http://sxxqsfxj.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15

On “Simple” and “Warm” Character of “Nanyang” Indigenous i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Works

LUO Ke-li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ks which wrote “Nanyang” indigenous image b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diversity in Nanyang. Each writer shows different local images. However, it almost emerges some kind of the same cultural character, like “simple” and “warm”. The writers respectively give them multiple and rich cultural meaning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writers; “Nanyang”; indigenous image; “simple” character; “warm” character

“南洋”是一个民族生态十分复杂、富于多样性的人群社会，除了地理构造的差异，其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都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从历史上看，“南洋”处于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人们称之为人类广泛交往的“枢纽”与“桥梁”。当地既存留最早进入“南洋”地区的原始种族人群，又有后来入迁的多种民族与当地土著结合，形成新族群在“南洋”生息繁衍，因而“南洋”各国毫无例外几乎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100个以上民族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90多个民族的有菲律宾，50多个民族的有越南，30多个民族的有缅甸等。民族和语言的

多样性带来了“南洋”诸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复合与丰富多彩，并相互交光互影，各具特色。活存于“南洋”当地的各国土生人民自然也是面像

各异，精神不一，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却有几点通约性的生动文化性格特质，下面一一解析之。

一、“纯性”类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南洋”人的“纯性”类征表现在剔除一切“文明”虚饰，按照一种纯自由生命的心灵状态活存。纯朴、老实、自然是现代作家对他们“纯性”类征的一般归纳，对于此种心性，一些作

收稿日期：2015-09-15；修回日期：2015-09-15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课题(12XD007)

作者简介：罗克凌，男，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人人文情志、文化心灵。

家表现出礼赞、钦赏的情感倾向,另一些作家则对“纯性”之反向意味——痴、拙、笨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揶揄。

1. 行止衣饰。由于“南洋”属热带气候,“南洋”人的行路风格便少有穿鞋的,他们大部喜欢赤足行走:

印尼人爱赤足行路,步履轻轻,仿佛不愿自己的脚步声惊动了别人,而显出自己的存在来。(巴人《印尼散记》)^{[1]319}

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和他的身份好象都是差不多,他们都拖着木板屐,或穿上脚趾全露的凉鞋,印度人和马来人更是连木屐也不穿,那样随便地赤着脚板。(陈残云《热带惊涛录》)

他们蹑着、谈着,有一个马来女人迎面走来。她穿着白色窄身短上衣,披着长长的纱朗,赤足,平扁的橄榄色脸孔,有一颗小黑痣,样子斯文,面带愁容。(陈残云《热带惊涛录》)^{[2]33,222}

这种不带“文明”束缚的文化现象彰显了“南洋”人的真朴、纯真和与大自然无冲突的水乳交融生活情态,而在这种纯“自然”的生命状态中也寄予了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艳羡和褒赞,比如巴人写及印尼女穿沙笼的美时便几乎灌注了十足诗意的笔墨:

她常常把纱笼结在乳房的上部,露出肩膀和臂膀,出现在这屋子的前后。印尼女人最美丽的装束,我认为就是那样的。不论她脸子如何瘦削,毫无美丽之处,但她这结着纱笼,首先使二个圆肩膀,显出那样有生命的自然美,而缠着纱笼下来,就可看到紧扎的腰部与丰满的臂部。再接着是有弹性的坚实的两只高高地赤露的腿子和腿踵。她随意地走着,与乡野的自然配合得非常匀称。(巴人《印尼散记》)^{[1]276}

对“南洋”原生态美的行止衣饰礼赞事实上也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德性文化规训太严厉的批判性反观。“南洋”人崇尚“美”的自然装饰,有时甚而可以上升到精神图腾的高度,印尼妇女的视“金”不是“钱”便是很好的典例:

而印尼人苦力妇女们爱带首饰呢,倒不是为了的金子值钱,显示阔绰,谁都知道那是假金饰,谁也不会因为你有了金饰看重你的身份,而是为了天真的爱好。他们古老的习惯,并不把金子作为硬通货使用,而是作为装饰品的。这样的落后社会里的人们,被夺去了爱好的东西,便也甘愿撕裂爱情的结合。(巴人《印尼散记》)^{[1]295}

为了一个单纯的自然爱好,印尼妇女不惜“撕裂

爱情”,可见这种“天真的喜好”空前“人类童年”地纯彻。在常人看来,因金饰品的不得而与男人决裂充其量表明女人“物质性”的贪财与虚荣,作者却深层次挖掘出另一文化涵蕴的原始因——“纯”性的民族古老习惯,显见了巴人文化随笔考察的敏锐与深度,从而也打消了中国文化窥伺镜城里不必要的“恶”性解读与无谓迷思。

2. 婚俗女性。在婚俗和女性地位方面,“南洋”某些地区的土著人也显现出天然纯性的开明色彩,比如许地山和杜埃笔下的“南洋”女性:

缅甸的风俗,子女的婚嫁本没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许地山《缀网劳蛛》)^{[3]11}

“菲律宾要比你们中国好。女人在家庭还有一些地位,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能不装着尊重女人哩”。

真的!菲律宾的风俗,刚和我们相反。她们在家庭中占有管理权,丈夫是要受到不少限制的。男孩子长大了,便离开家庭出去另外成家立业。而女孩子长大了却留在家里,把女婿接过来,一家生活到老。(杜埃《在吕宋平原》)^{[4]48}

菲律宾有个尊重妇女的习惯;菲律宾风俗殴打和污辱妇女是可鄙的;菲律宾法律至少还有这么一条:殴打妇女是最可耻的行为!(杜埃《风雨太平洋》)^{[5]27,45,238}

男女的婚嫁不必经过中国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表达的是情恋自由的纯性色彩,没有过多礼教沉重的拘囚,事实上也是人性解放达至纯美境界的文化征象,作为与中国婚俗的反向比照,作者许地山无疑寄注了对中国婚姻观念结构的不满以及冀望中国向缅甸纯自由婚恋文化进行内在学习。与此同态意向申衍的是女性文化地位的提升,菲律宾女性地位根本与中国的“男尊女卑”文化截然相反,依据他们当地的风俗,妇女在家庭里享有管理者的独尊威权,而殴打和污辱妇女则是最可鄙的行为,要受到公序良俗的恶谴,这也是当地人纯性文化的一种诠释,它没有遭罹男权文化历史积垢的污渎,从而表现出一种前俄狄浦斯时代的原始纯真生活丰采。

3. 生存过活。在生存过活方面,“南洋”人亦有简易淳朴、毫无机巧伪饰的从容:

不用床了,学学菲律宾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卧(杜埃《风雨太平洋》)^{[5]98}

菲律宾气候太妙,什么地方都可当床睡觉,除了雨季。(杜埃《风雨太平洋》)^{[5]444}

在他看来,这里面的人都是平民化的,不摆架子

的，甚至连有钱的头家也一样。有一些衣饰漂亮、颈项上挂着大金链，又戴上钻石耳环的女人，也不会装模作样，象香港女人那样动不动就给人轻蔑的眼色。因而陈登觉得满舒服，觉得自己并不渺小。杜青松和他有相同的感觉，他赞赏这平静而淳朴的生活。（陈残云《热带惊涛录》）^{[2]33}

当然除了羡慕的臆想以外也有反讽的声音，比如洪灵菲笔下的“南洋”人：

他们过的差不多是一种原人的生活，倦了便在柔茸的草原上睡，热了便在茂密的树荫下纳凉，渴了便饮着河水，饿了便有各种土产供他们食饱。他们乐天安命，绝少苦恼，本来真是值得羡慕的。（洪灵菲《流亡》）^{[6]100}

与上面文字表面意思“本来真是值得羡慕”相左，隐含作者在文字暗里却反向表达了一种对“南洋”人不文明生活方式的鄙蔑与不屑，从而彻心彻骨地维护了中国“开化”文明生活的礼道尊严。然而“南洋”人貌似无目的性的“疏懒”生活方式呈现的亦是一种回复自然的高贵情性，这种“疏懒”精神元素可能正是心灵纯真、清新的氧气，“它的极致就是植物化：‘最高、最完善的生活无非是一种纯粹的植物化。’植物看来是‘一切自然形式中最端正、最优美的’”^{[7]67}，“南洋”人“原人”式“植物化”自然生活方式的“端正”、“优美”面无疑被作家洪灵菲所盲视与遮蔽。

4. 人性观念。在人性观念层面，“南洋”人也大多表现出纯性的善良与无邪，只是“文明”世界的侵染使他们的本真心性受到了荼毒，比如巴人在《印尼散记》中描写了印尼人前期的无机心与后期得到了私有社会“文明”精神训练后变得“机智”起来的无奈：

“那没有什么，一切我‘扰总’跟你们办好。爪哇人容易说话，只要你一松一紧，一打一拉，一软一硬，叫他摸不着你中心，他着急了，事情就落局。再说，他赌钱输狠了，急要钱呢。”柯先生说。（巴人《印尼散记》）^{[1]256}

印尼人一般缺少强烈的私有观念。积钱，想从钱中去生利息，很少印尼人有这习惯，然而为了生活，私有社会的法则，却开发了他们的机智，需要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说他们是掠夺了我们的吧。（巴人《印尼散记》）^{[1]264}

“爪哇人容易说话”、容易上当受骗是人物柯先生对印尼人心灵“思无邪”的傲慢认知，在柯先生的自大式嘲讽言述中，作家巴人进行了深度反思，一方

面表达了印尼人“纯心”不再的悲惋，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智巧与聪明也投注了反讽的谴责。无独有偶，萧乾在其特写《印缅友谊值得争取》一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甚而前五天记者在滇越车上，还看见我们的高等难民正心怀敌意地鄙视欺凌同车越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彻底清除那点天朝的优越感呢？什么时候才识点时务呢？一颗真朴的心是不难争取的，但我们自己须先具备一颗呵！”^{[8]148,149}，越人“真朴的心”便是他们“纯性”的体现，而文化自大的中国人明显缺匮，作者通过内省式的疾声呼吁再次肯认了越南人“纯洁”品性的无上可贵，同时也对中国“夜郎自大”的国民劣根性毫不遮饰地痛下针砭。

二、“热”性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原像之另一类征便是“热”性，“南洋”人的“热”性类征通常表现为三种形态，即热烈、热情与热狂。首先是情性热烈，他们没有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含蓄与内敛。以菲律宾人为例，作家杜埃在其小说《风雨太平洋》中写道：“菲人比我们活泼乐天，思想上没太多束缚”^{[5]301}，思想上自由轻松，自然心性上也无有压迫性挂碍，从而便没有隐曲遁默的矫情必要，菲律宾人可以完全展现出他们最“活泼乐天”的直露情怀。此外，菲律宾人“演说时总是声调激昂的，非常庄重，正如一般菲律宾中上级干部一样，他们演说时的庄严性，狂烈性，都有一个共通点，声音战栗而又发出威力，使所有的听众都肃然起敬。这也许是由于宗教和家長制的某些影响所致”^{[4]26,27}，“热带的人易动感情”^{[5]215}，“谈起政权，一般的菲律宾人都要显露出煽动家的热情。你随处可以见到，普通的演说者都带有一种令我们华侨惊异的热情，就好像他们的朗诵诗一样，声调高昂而凄厉，激动的情感像黄河的水，自半天的高原倾泻而下”^{[9]8}，“正如一般菲律宾中上级干部一样，他们演说时的庄严性，狂烈性，都有一个共通点，声音战栗而又发出威力，使所有的听众都肃然起敬”^{[9]26}……，菲律宾人演说的言辞狂烈而富有感染力，作者认为乃宗教和家長制所致，菲人信奉从早期殖民者西班牙移植入境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具有的神圣威严及布道时的修辞效果影响了菲人演说者的声气、语调及虔诚感，而家長制的威权也影响了听众的信从心理，两者的有机合力促成了菲人演说热烈心性的开达与豁通。其次是待客的热心、热情与过从的热络，杜埃在《风雨太平洋》中写道：“热情好客，

这是我们菲律宾人的传统美德”，“菲人对讨人家的东西吃，并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吃光了再说的性格；有一种互助和好客的美德，对陌生人也不例外。‘你没有的，我给你。’用不着偿还”，“但菲人就是这样，你送他一点东西，她总要想办法回点什么”^{[5]296, 228, 434}。此外，在《在吕宋平原》中，杜埃也有这样的描述：“在平原的村庄，你还可以看到一种与中国纯然不同的风俗，你无论到哪个村庄，假如有一家人在做什么节目，或跳舞会，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那家的主人，你都可以去参加，你可以安然地毫无愧色的得到一份食物。他们对客人有一种责任似的，而且引为荣幸”^{[4]27}，“菲律宾人有一种爱客的风俗，当他拿出饭来，你要是推辞，他是会生气的”^{[4]146}……，总而言之，“互助”与“好客”表达了菲律宾人心胸豁达、与人为善的优秀内在品质，与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节制文化相比，菲人摒弃一切心理虚矫，以一种开阔而赤裸、不带任何城府的豪爽明净风格处事，故有“讨人家的东西吃，并不觉得失面子”、“吃光了再说的性格”、对陌生人视同熟人一般慷慨施物以及赠必有回的国民性可爱文化现象。热烈性如若遭遇负面阻遏，其心理激能便可以转化为爆炸性排山倒海的反抗气势，这便是“南洋”人的第三个文化特质：热狂。鲁迅先生曾经在《坟·杂忆》中礼赞过菲律宾的民族英雄黎刹：“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 Adam Mich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 Petofi Saador；飞猎滨（今译为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今译为黎刹），——他的祖先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10]343, 344}，菲人的“热”性至此便转为英雄式“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再比如杜埃《在吕宋平原》中写到的一个名叫番娜的菲律宾农会妇女部长，她是抗战时期村里的妇女领袖，她聪明机智，性格豪辣，敢于为人民说话，具有十分勇敢的战斗精神，因而被村里的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会啼的母鸡”^{[4]45}，这是菲律宾人“热”性显现的另一生动形象佐证。“南洋”人的“热”性类征如若偏向“恶”质的一面，有时也会生发出非理性的不当热狂来，比如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在“南洋”便时有发生，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也作过毫不掩饰的思想对话实录，以下便是文本中部分菲律宾人偏执的文化观念声音：

中国人全不是东西，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寄多少钱回唐山去，这些钱是什么人的？全是我们的血汗。不赶走中国人，我们菲岛的人永远也翻不了身。（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11]118}

对菲岛的侵略主义，发源自欧洲的西班牙，而后中国人继承了它。美国人也不是好东西，但他并没有在菲岛生下根，他们是迟早要被赶出去的，只有中国人可怕。他们在菲岛国境内不论城市，农村，以至僻静的去处，都生了根。他们没有拿到形式上的统治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统治者，比美国还可怕。因为美国人仅仅拿到政治权，而中国人把持着全国经济命脉。（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11]125}

这些情绪化声音的历史呈现虽说事出有因，却几乎皆出于极端、偏激的非理智精神反弹，在另一面相上也展现了菲律宾人“热”性类征的“非正途”歧向膨胀。总而言之，以菲律宾人作为个案言说并非仅只菲律宾人独自所有，“南洋”其它地区的人亦有相通的性格徽记，“南洋”“热”之地理风候陶养了所有“南洋”人的“热”性类征，这种“精神气温带”（泰纳语）人文类征的本色披显内在尖锐地潜涵了无可避免的正、反题二律背反之心理情境。

【参考文献】

- [1] 巴人. 印尼散记[M].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巴人文集》编委会编. 巴人文集·回忆录卷[C].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7.
- [2] 陈残云. 热带惊涛录[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 [3] 许地山. 缀网劳蛛. 集原版珍藏[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4] 杜埃. 在吕宋平原[M]. 广州: 人间书屋出版社, 1950.
- [5] 杜埃. 风雨太平洋. 第一部[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
- [6] 洪灵菲. 洪灵菲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7] [丹麦]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M]. 刘半九,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8] 萧乾. 萧乾全集. 第二卷·特写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 [9] 马宁. 南洋风雨[M]. 桂林: 椰风出版社, 1943.
- [10] 陈漱渝, 肖振鸣. 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 1923-1925[C].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司马文森. 南洋淘金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李兆平】